

主编
麦永雄

東方叢刊

2006.3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东方文化 / 东方美学 / 东方文论 / 东方文学 / 比较诗学 / 比较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方丛刊

李长林题

Dongfang Congkan

主编/麦永雄

中 华 美 学 学 会
中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
中 国 中 外 文 艺 理 论 学 会
全 国 高 校 东 方 文 学 研 究 会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中 文 系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联合
主办

2006年第3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丛刊. 2006 年. 第 3 辑 / 麦永雄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33-6174-X

I. 东… II. 孙… III. 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31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1 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东方丛刊》

顾问

特约编委

编委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季羨林 贺祥麟

丁 帆 王 杰

叶 朗 乐黛云

刘纲纪 刘中树

朱立元 吴元迈

饶芑子 郭齐勇

钱中文 黄宝生

童庆炳 曹顺庆

董晓萍 曾繁仁

王德明 孙建元

麦永雄 张明非

张利群 肖启明

何林夏 胡大雷

莫其逊 黄伟林

覃德清 雷 锐

主编 / 麦永雄
编辑部主任 / 宋瑞兰
编辑 / 莫道才
/ 廖国伟



通讯地址：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东方丛刊》编辑部
邮编：541004 电话：0773-5846040
电邮：dfck1992@126.com dfck1992@163.com
网址：<http://courses.gxnu.edu.cn/chinese/gdwx/dfck.html>

-
- 封面题字 启 功
□ 责任编辑 麦永雄
陈 亮
□ 装帧设计 张 明

目 录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

孙昌武	主持人语: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感想 (2)
尚丽新	刘萨诃信仰解读 ——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 (6)
王国安	论柳宗元的佛教天台宗信仰 (24)
李小荣	敦煌佛教劝化音乐文学略说 (40)
张培锋	宋代士大夫佛学的道德品格初探 (58)
张子开	“醒世诗”考辨 (76)
刘晓珍	稼轩词与禅 (102)

文艺美学

-
- | | | |
|-----|---|-------|
| 陈良运 |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观念发生与流变述略 | (120) |
| 李咏吟 | 寻求审美目的与人生目的之和谐 | (135) |
| 李 涛 | 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核心范畴 | (154) |
| 杨健平 | 东西方艺术交流中的证异审美效应 | (171) |
| 曾 军 | 视取向:视觉的艺术 | (188) |
| 江朝辉 | 边缘与中心的对话
——狂欢化理论视域下的赵本山喜剧小品文化
..... | (202) |
-

东方讲坛

-
- | | | |
|-----|-----------------|-------|
| 症 弦 | 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 | (215) |
|-----|-----------------|-------|
-

东方文库

-
- | | | |
|-----|-----------------------------------|-------|
| 吴 微 | 从亲和到遗弃:桐城派与京师大学堂的文化因缘
..... | (242) |
| 肖翠云 | 文体形式与意义阐释
——赵宪章的“形式美学”批评 | (255) |
-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专栏主持人 孙昌武教授简介

孙昌武(1937—), 辽宁人, 南开大学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专攻隋唐五代文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辽宁营口市担任师范学校教员, 至 1979 年奉调回南开大学任教至今。从事隋唐五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旁及于佛教、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关系领域。研究成果主要在古典散文和文学与宗教关系两个方面, 主要有《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 台湾谷风出版社)、《中国佛教文论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诗与禅》(台湾大东图书出版公司)、《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台湾东华书局)、《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曾历访港、澳、台和亚、欧、美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 从事教学、研究, 进行学术交流。

主持人语：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感想

◎ 孙昌武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季羨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

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古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我和佛教研究》，《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佛教与中国文化》第 22～23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如今这样的看法已经成为更多人的共识。本人的专业是中国古代

文学,在教学和研习过程中对这一点有了越来越深切的体会。因此也就不避谀陋,这些年关注并尝试做一些有关佛教和佛教文学、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承《东方丛刊》编者不弃,命我组织这个“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论文专栏,又承各位作者支持,得以把下面一组论作贡献给读者。

近年来,正由于有季先生等一批有开阔学术眼光、又做了筚路蓝缕工作的前辈学者的谆谆教诲和带动、鼓励,又有众多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和参与,有关佛教和佛教文学、佛教文化的研究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断有高水平的论著问世。特别是一些以相关内容为选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更多有精研深思、探赜索隐的精彩之作,显示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实力。而青年一代学者正代表着学术的未来,更让人感奋。不过依我个人的浅见,我国有关宗教的学术研究,整体上已经荒疏日久。造成这种局面,有历史传统、学术观念、革命时期政策层面等诸多方面原因,三言两语难以道尽。不过总体形势很清楚,尽管这些年来学术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有关宗教的研究也已取得相当进展,但一门学术的起衰救弊非一日可以成功,因此真正改变宗教学术研究的落后局面尚需时日,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做出更大、更持久的努力。但可以相信,只要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持续努力,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就能够实现季先生所期待的彻底改变落后局面的前景。

下面贡献给读者的这个专栏,是几位学术上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有关佛教对中国古典文学影响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他们的工作,可以略窥相关学术领域进展的趋势,值得重视。

陈寅恪曾指出:

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不如佛道二

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另一位外国学者戴维森则说:

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J. 勒卢瓦·戴维森《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巴沙姆主编《印度佛教史》第669页,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佛教作为支撑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影响遍及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学则是受这种影响十分广泛而深刻的领域之一。这些年来已有许多人在这一研究领域付出巨大努力。不过至今的成果,大都集中在佛教对于文人思想、生活和各种体裁作品的影响方面。而佛教与文学相互影响、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作用的关系十分复杂,值得研究的课题也十分广泛。本专栏六篇文章涵盖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既有论及具体作家、作品的,也有宏观上考察一种社会现象的;有研究上层“知识精英”信仰的,也有探讨民间信仰的;有具体考证作品的,还有扩展到音乐领域的。这样,这个小小的专栏就体现了研究内容、方法的丰富和多样,而这种丰富和多样正与研究的深入、细致相关联。

由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入,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领域。就本专栏的文章而论,比如寒山诗传承有绪(与王梵志诗的情形不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其作品的真伪仍留有考辨余地;中外学者有关刘萨诃已有许多论著,但如今对于相关传说内涵的深层次、多方面意义远远没有探索穷尽。至于人们久已关

注的名作家,如柳宗元、辛弃疾等,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仍然有很多。本专栏的几篇文章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而正因为有关佛教的研究在历史上长期被忽略,所以到处是空白,可供研究者填充。这样一片有待耕耘的沃土,只要勤于开拓,勇于创新,付出劳动,必将取得丰硕的收获。

又,正因为这是研究基础薄弱的领域,则更亟需多做基础性的工作,特别是资料的搜集,典型个案的研究,等等。前段时间我和欧洲一位著名中国学家赫莫耶先生通电话,讨论研究一部佛经的计划。接触过海外中国学的人都知道,赫莫耶是目前海外中国学界泰斗式的人物。可是他说自己没有力量作大题目,只能就一部经典一步步来做。这是学术大家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态度和学风。如今中国从事与佛教相关学术研究的学者,科班出身的人很少,一般来说知识结构都难免欠缺。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关心佛教学术几十年,但实际学识还很浅薄。只因为多有朋友督促,写些相关文字,往往是仓促操觚,算不上认真的研究著作。所以鄙以为就绝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青年学者),当前还不是做大部头的总结性论著、提出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本专栏发表的几篇文章,水平高低要由读者评价,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都能够从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都不做放言高论,都有些新的见解,因而都不是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加以剪裁、拼凑成篇的。实际上一篇学术文字,或许结论值得商榷,但只要发掘、提出一条新资料,也算是一点贡献,比言之无物的长篇空论也更有价值。

编辑这样一个专栏,介绍几篇文章,也是想通过实例说明以上几点认识。我觉得比起这几篇文章本身的学术内容来,作者们在文章中体现的研究思路、方法或许更值得重视,也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有关佛教学术的研究工作,也希望这个小小的专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刘萨诃信仰解读

——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

◎ 尚丽新

刘萨诃^①和尚，本是一个湮没在僧传中的南北朝时期的高僧，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敦煌相关文物和文献的发现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尽管关注的热点聚焦在刘萨诃和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上，但在梳理相关材料的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巨大的隐秘，使这个和尚闪烁出一种卓然不群的光辉。

虽然这位活动在 4 世纪下半叶到 5 世纪初的刘萨诃和尚确有其人，但各种文献、文物所反映出的他的“事迹”却大多是充满了神秘灵异色彩的不断地增殖繁衍的“传说”的碎片。在这些碎片中，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凡夫俗子逐渐被演化成神佛的过程。这个原本目不识丁的稽胡族下级军吏，30 岁时巡游地狱的偶发事件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由一个杀生为业的罪人变成了一个精勤福业的游方僧人。^②他去江东寻觅礼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的传说给江南佛教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一个普通僧人而名列宝唱的《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同时，随着他在稽胡人聚居地（今天晋陕交界的黄河两

岸)的传教事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他那神奇的巫术和预言能力,刘萨诃成为稽胡族的民族神,被视为观音化身、“苏合圣”、“胡师佛”。^③到了6世纪20年代,在河西走廊的番禾(今甘肃永昌)出现了著名的能预测兴衰治乱的番禾瑞像^④,而刘萨诃就是番禾瑞像的预言人,随着番禾瑞像影响的不断增加,刘萨诃的名气也达到顶峰,从而成为北朝直至隋唐西北地区的一个强有影响力的神灵。从现今发现的敦煌莫高窟中的相关的资料来看,刘萨诃的神奇传说在敦煌一带不断衍生,归义军时期又掀起了一个崇拜番禾瑞像和刘萨诃的高潮。

如果仅就神秘灵异这一点将刘萨诃视为佛图澄、杯度之流的神异僧,那无疑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除了神秘灵异,他至少还有这样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第一,刘萨诃是由一个稽胡族的凡夫俗子的身份而成佛的,他的民间出身不带有任何异域的、神秘的色彩;第二,刘萨诃传说绵亘在东晋到唐五代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集中在晋陕交界处黄河两岸的稽胡聚居地和河西走廊一带的多民族聚居地;第三,刘萨诃是一个来自民间的神,虽然受到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的不断规约,他的传说总体上仍呈现出一种民间本色。因此,可以说,刘萨诃传说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断神化的过程典型地折射出公元4世纪到10世纪民众的佛教信仰。

佛教入华后,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相融合,关于此点,不仅史不绝书,且学术界之研究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却是佛教史研究上一个众所周知的缺憾。也许,对刘萨诃这个身份、地位都很特殊的“高僧”的研究可以稍稍弥补这一缺憾。本文正是想通过刘萨诃传说的解读,展现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一个侧面,从而对民间佛教信仰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做一点探讨。

一、民间造神运动：胡师佛、番禾瑞像

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一个犯了杀生大罪的凡夫是如何成为神佛的？是一种怎样的信仰力量推动当时的民众创造出这样一个神明来呢？而这样一个神明又是如何能长久地存留于民众的信仰之中？

残存的史料表明，作为神的刘萨诃具有两种最重要的身份：一是稽胡族的民族神，二是西北地区的地方神。下文即从考察这两种身份入手，对于民间如何创造刘萨诃这一神佛做一番具体了解。

（一）胡师佛

唐初，道宣历游关表，亲自在稽胡聚居的慈、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做考察，看到了刘萨诃以民族神的身份被当地民众崇拜信仰的盛况：“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名‘胡师佛’也。”^⑤

据《周书·稽胡传》的记载，稽胡族是一个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其社会组织形式为部落制，且部落之间联系松弛，不可能发展成一个有统一政权的强大民族。其社会经济应为半牧半农。作为稽胡的一员，刘萨诃大约出生在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稍前，他“目不识字，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⑥在31岁时（那时稽胡处于苻秦统治之下）经历了人生中奇异的转折——因为杀鹿被勾入冥界，在地狱中接受观音的训导、皈依佛法而得以还阳。从后来《冥祥记》、《高僧传》等著述记录或转述这个传说来看，它流传的范围相当广，而且影响也很大。地狱将其极端的恐怖呈现在这些凶顽勇健的稽胡人面前，使这些在战场上无比勇敢的稽胡人恐惧了，而观音又为这些犯杀生大戒的人指出一条生路——皈依佛。这个异常完美地将当时流行的地狱信仰和观音信仰结合在一起的冥

游事件,既改变了刘萨诃的命运,也为其日后成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起点。刘萨诃还阳后出家为僧,按照观音训导开始了他的礼拜圣迹的云游生涯。后来他又回到家乡,大约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也就是十六国末期和北魏初期,他在稽胡中展开传教活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五载刘萨诃曾于云岩坐禅:“云岩县……废可野寺,在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诃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惟北面一面通人焉。”^⑦抄写于10世纪的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中提到和尚为赫连驹耳王治病、使其驹耳复为人耳一事,虽然在十六国之一的赫连夏国的相关史籍上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位驹耳王,但这个传说的产生必然是因为刘萨诃在夏国传教且有一定的影响。而夏国在地理上与稽胡聚居地是相邻的。以上这些记载表明,刘萨诃生前长时期在稽胡居地及周围地区传教,有了相当的影响。各种记载表明,刘萨诃的晚年应是在西行的漫漫长路上度过的,最后,他生命结束在酒泉。可以想见,西行之路必也是传教之路,因此公元520年出世的番禾瑞像被归功于刘萨诃太延元年(435年)的预言也就不足为奇。可以说至晚在6世纪初,从稽胡聚居地到河西走廊,刘萨诃已成功地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并且形成了相当有影响的刘萨诃信仰。我们想知道刘萨诃何以成为稽胡人和西北各民族信仰中极为重要的神明,换句话说来说就是:稽胡与西北各民族出于何种原因创造了胡师佛和番禾瑞像?

在关于刘萨诃所有神异传说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苏合圣”了:“昼在高塔,为众说法;夜入茧中,以自沉隐;旦从茧出,初不宁舍。故俗名为苏何圣。‘苏何’者,稽胡名茧也。以从茧宿,故以名焉。”“然今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刹,系以蚕茧,拟达之止也。”^⑧道宣的这番记载显然表明刘萨诃在稽胡八州之地是备受供奉的蚕神。蚕桑起源于中国,素来农桑并举,蚕桑业一直都是传统农耕社会重要的经济支柱,起着衣被天下的重要作用,由此也不断产生了各式各样